高桥匠人与外滩老建筑(上)

◆ 娄承浩 薛顺生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北部的的高桥，是一个有着千年悠久历史的古镇,北濒长江口,西临黄浦江，东连外高桥港口和保税区,南接高行镇。其历史特色正如老浦东人沈润章老先生所说：唐宋时期高桥是盐业的集散之乡,元明时期是沙船之乡,明清时期是纺织之乡。

到了近代，高桥人勇闯上海滩，又成为占据上海营造业半壁江山的浦东帮的生力军。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23幢高楼大厦有三分之一出于高桥工匠之手，上海许多桥梁、厂房、花园洋房、里弄住宅、高楼大厦,都是高桥人的杰作。

■ 汇中饭店(和平饭店南楼)

高桥匠人的伯乐

若推高桥营造商的引路人,有一位不得不提,虽然他并非高桥人,但却作为建筑施工业浦东帮的鼻祖，成为后来带领多位高桥工匠闯荡上海滩的伯乐。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后，西方投资者纷纷接踵而来,开设码头、仓库、洋行、教堂等，许多建设项目均由外国人设计、外国公司施工。川沙蔡路镇做泥水工出身的杨斯盛当时边学技艺边学英语，结识了一些外国人,他的一手好技艺也得到外国业主的赏识。杨斯盛独具慧眼,1880年创办了中国人开设的第一家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1891年上海江海关施工招标,杨斯盛勇敢地和德、意两家外商竞标,在外国势力霸占的上海建筑市场,一个无名的营造厂怎么能中标呢?最后是意商皮特尔中标。

上海是软土地基，地下水位很高，意商在施工时遇到地下水位上涨无法打桩的难题,致使工程停工。于是杨斯盛接标承建这项工程,他亲自督战,解决了一个个施工问题,保质按时完成了江海关大楼的承建任务,使外国人不得不折服,赢得了同行的赞誉。

杨斯盛的成功，使高桥人看到了发展的前景，同时也使在沪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工匠的轻视。中国的建筑工匠熟悉地理环境，劳动力又低廉，这是外国建筑商无法抗衡的独特优势，从此中国营造商冲出了一条生路。

王松云与汇中饭店

王松云是高桥陆家宅人，比杨斯盛小六岁,从小随父学习水木作,20岁时在上海山海关路一家营造厂做档手(小包工),后来又与宁波人合开仁泰营造厂。他与杨斯盛都是浦东人,私交甚深。杨斯盛创设营造厂时,他入股助一臂之力,杨斯盛筹办浦东帮水木业公所时，他又积极赞成并捐资500元。

只读过私塾的王松云不仅手艺好,会经营,还结识了西恩科、哈同等外国人。1904年哈同把爱俪园交给仁泰营造厂建造，至1907年筑成大小楼宇80个、阁8座、亭48个、台12个、池沼8个、水榭4个,具有10个大院9条道路。1909年全部建成,爱俪园成了海上大观园,社会各界人士都慕名而来，王松云由此扬名。

王松云在承建爱俪园时，还独自开设王发记营造厂，承建外滩当时的最高建筑——汇中饭店大楼。一开始英国人不放心，因为王松云虽然眼下在做爱俪园工程，但都是二三层建筑,而汇中饭店高达六层,并且建在江边,技术难度高。

当英国业主犹豫不决时，建造江海关大楼的杨斯盛在关键时刻为朋友挺身而出,愿做担保人,英国人才将汇中饭店工程发包给王发记营造厂。在建造过程中果然发生地基倾斜问题，杨斯盛凭借着建造江海关大楼时积累的宝贵经验，帮助王松云解决了难题,化险为夷。

敢啃硬骨头的周瑞庭

周瑞庭也是高桥第一批营造商之一。他家庭贫苦,父亲是木匠,勤劳仍不能摆脱贫困。他11岁到上海当木工，木工技艺很好,19岁时当上木工档手,先后在杨斯盛、顾兰洲手下承包工程。1895年在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446号开设周瑞记营造厂。

由于他在承包工程中熟悉西方近代建筑,懂得英文又会经营,很快在营造业中崭露头角。他先后承建的项目有礼查饭店、杨树浦发电厂一期工程、俄国公馆(苏联领事馆)、扬子大楼、新闻报馆、敬业中学、四行储蓄会虹口分会大楼、圣三一堂翻建和乍浦路桥等。

周瑞庭以敢啃硬骨头著称。1913年在承建杨树浦发电厂一期工程时,因工程地处黄浦江下游,与复兴岛隔江相望,水流特别急,围坝打桩时因江水急,泥沙流失,多次打桩都告失败。周瑞庭到外滩天文台了解了黄浦江潮汛资料后,携长子周星若将铺盖搬到工地,深入了解打桩失败原因,与工人师傅商量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决定用旧棉胎裹桩,在挡水坝中加进牛粪和明矾,这个土办法果然见效,打桩获得成功。

俄国公馆建在苏州河口，而且有地下室,同样遇到塌方问题,周瑞庭用同样方法很快解决了。周瑞庭在同行中有很高声誉，曾担任由杨斯盛创议的浦东帮和绍兴帮联合组织——沪绍水木公所的董事长。

高桥首富钟惠山

钟惠山也是高桥早期的营造商，他出身在贫苦农家,4岁丧父,从小从师学泥工,手艺好,人品好,在南浔为刘姓大户人家修建祖坟,施工精良,深得东家信任。刘姓大户在上海购地建造大批里弄住宅时,钟惠山已在上海七浦路386号开设钟惠山营造厂,由于过去的人缘,刘姓大户建造大批里弄住宅的项目全部交给他承建。

钟惠山施工质量让人信得过,报料报价实事求是,声誉传四方,建造里弄住宅从九江路、浙江路、广东路、福州路,扩展至闸北、曹家渡。建造上海石库门里弄使钟惠山发迹,他虽然没有承建有名的高楼大厦,但是有了积累,于是投资房产,成了拥有大量房产的营造商。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国家处在战乱时期，而上海城市却处在迅速发展阶段,地皮飞涨,房屋稀缺,钟惠山在不动产上赚了大钱,成为高桥首富。

第四极

许 晨

10.“蛟龙”入水

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航行,7月15日凌晨,“向阳红09”船到达预定海域——北纬15°32.627′,东经155°18.852′,西北太平洋麦哲伦海山附近。按照现场指挥部的决定,本航次的首次下潜将在16日7时许实施,这也是“蛟龙”号的第75潜次。此次下潜人员由叶聪、傅文韬、何震组成。小傅为主驾驶,叶聪总负责，何震是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技术人员，负责试验新近研制的一台名为“龙珠”的小型无人潜水器。

精心筹备大半年，又在海上漂泊20多天,终于可以下潜了,全体科考队员都十分兴奋，抓紧时间完成检测和备料，做好一切准备。由于“蛟龙”号的下潜上浮采用无动力设计,所以必须根据不同深度、不同海域、潜航员体重和深潜器自重精确计算压载体的配重,这是一项精细严谨的工作。我晚饭后来到后甲板时，只见灯火通明，许多身穿蓝色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着,专用铲车把一块块紫红色的铸铁块推过来，按照指挥者的要求,一点一点升高,推进,慢慢地把压载铁装进“蛟龙”号的下腹两侧……

16日早晨7时,总指挥一声令下:准备下潜的人员各就各位。我也连忙穿戴好工作服、安全帽,拿着相机来到后甲板。傅文韬、叶聪、何震沿着扶梯走到舱口旁,笑着向大家挥挥手,依次进入“蛟龙”号。随后,两名助手撤去通风管和小梯,盖好舱口盖。同时,另有人按动控制器开关,“蛟龙”号从轨道车上缓缓向后移去,在橘黄色A形架下停住,挂主吊缆，四个类似吸盘样的止荡器紧紧扣住。而后,一阵隆隆的轰鸣声响起,A型架向船艉外面摆去。与此同时,4名穿着橘黄色救生衣的“蛙人”从左舷沿着晃晃悠悠的软梯下到海面,登上早先放下的一只橡皮摩托艇。随着发动机的一声轰鸣,摩托艇箭一样驶离母船,绕了一个圈了,在船艉数十米远处停下待命,在海浪间忽隐忽现。今天海上浪高近两米,约是四级海况,属于“蛟龙”号下水的上限。

A形架很快摆动到位,“蛟龙”号上的止荡器脱离,只留一根吊在腰部的主缆,绞车开动,慢慢地将其放入海里。这时,等候一旁的“蛙人”小艇迅速靠了上去,一人稳住小艇,两人伸手抓住“蛟龙”号上方的把手,另一人利用涌浪一跃,爬到蛟龙身上,敏捷地摘去主吊缆和前面两根龙头缆(即拖曳缆),迅速回到艇上,小艇远远驶离。此时母船与“蛟龙”号完全脱离,“向阳红09”船也在船长指挥下迅速驶离,避免碰撞。

此时的海面上,红白两色的“蛟龙”号沉沉浮浮,风浪打来,溅起一团团白色浪花。它在水面上做最后的检查,建立水声通讯。“蛙人”小艇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按规定必须等待蛟龙顺利下潜后才能回归母船。终于,一切就绪:“蛟龙”号最后“喷吐”出一丝白浪,隐隐约约,转眼不见,蓝色海水又覆盖了一切……

按惯例，每年的首次下潜都是以检验熟悉性能为主,而后才是科学下潜(海洋科考)。此次下潜就是工程下潜,即检验、试验深潜器的性能和状况,从布放到回收约需十个小时。“蛟龙”号在水下的状态——包括下潜速度、深度、方位,以及母船围绕着“蛟龙”号行进的航迹、速度、航向等等信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这一切来自后甲板上的工作室,里边安装着两台柜式计算机，担任着收集和发送信息的任务,大家习惯地称其为“炮楼”。指挥部里的大屏幕上时刻监控着“蛟龙”号的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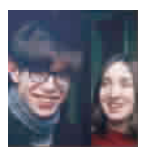
14时许,我来到“炮楼”里与值班的技术人员攀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项目组长祝普强是个热情聪慧的年轻人，也是跟随着“蛟龙”号成长起来的科技人员,受到过国家的表彰。这套“蛟龙号水面显控系统”就是以他为主研发成功的。他耐心细致地向我讲解了许多相关知识。蓦然,我注意到隔一会儿就会有一阵“嗡嗡”声,像是机器的噪音,便诧异地问:“这是什么声音?不要紧吧?”

小祝笑了:“没事,许老师,要是不响,我们可就顾不上说话了。”原来这声音来自水声通讯机,大屏幕上显示的潜深、舱内氧气、温度等信息都是通过这种“嗡嗡”声传送的。每隔64秒钟响一次,说明深潜器工作正常。

“这么说,它是幸福的噪音了。”“呵呵,差不离吧。我们听到它就感到幸福、踏实。”

我和霍金的生活

简·霍金 著 张敬 王翰民 译



14.陌生的家乡

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一个星期，加州物理学家雷·萨切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了一次郊外野炊的社交活动。这次活动让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物理学家背后的妻子和孩子们,不过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是一名安静的得州人——罗伯特·博耶。史蒂芬曾与他有过学术上的合作。罗伯特谈话时总会主动邀请我参与，他的谈话不会只局限于物理学。他让我认识到,大多数物理学家私下里都很友好且和蔼可亲。而一旦物理学家群聚时，他们就会无休止地陷入到专业领域的争论当中。

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在宿舍外的阶梯上乘凉。加州伯克利相对论研究小组的领头人亚伯·托布教授和他的妻子奇切坐在我们边上,一边赏月一边聊天。我从话语中察觉出亚伯希望邀请史蒂芬去他那里做研究，史蒂芬似乎也很感兴趣,不过两人并未达成正式合作。然而，正当我与史蒂芬漫步回到公寓时，史蒂芬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咳嗽,面部表情痛苦不堪。我们生活的阴影中的恶魔突然窜了出来,用它那邪恶的双手掐住史蒂芬的脖子,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上。我第一次见到史蒂芬这么严重的发病,彻底呆住了。慢慢地,史蒂芬艰难地比画着手势,示意我为他拍背。惊慌失措的我毫无顾忌地猛拍他的后背。幸运的是,病情来得快也去得快。

这次病魔的突然造访给我和史蒂芬当头一击。我们刚刚萌发的加州之梦还没来得及成型,就被阴霾的未来彻底抹杀了。

康奈尔大学的经历让我和史蒂芬变得成熟，待我们回到纽约,21岁的我成了一名勤勤恳恳的家庭主妇。而我丈夫经历的噩梦般的病痛侵扰远比我们设想的诸如运动能力消退更恐怖。更糟糕的是,我还觉察到了我婚姻生活中的第4个重要成员——物理学。她像情妇般令人讨厌,和妖妇一样没有怜悯之心,引诱她的崇拜者们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

不过在纽约，我们可以暂时从紧张的学习氛围中缓解出来，我与史蒂芬的关系也不会受到物理学的任何打扰，史蒂芬也不用把时间花在和其他同僚进行无休止的讨论上。弗兰克·霍金的一个同学将他在曼哈顿的一间公寓让给我和史蒂芬住。那个地点完美极了,我们能轻易抵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帝国大厦、时代广场和百老汇。

不过那年夏天的百老汇似乎没有太多戏剧可供选择，最终我们通常是欣赏音乐以度过周末的夜晚。慢慢地，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和纽约告别时我没有丝毫遗憾,我已迫不及待要回到我所熟知的休闲的,可以让我自由穿梭的家乡。那是一片富有历史的诗一般的大陆,那是一片安宁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亲近无间。不过,我对家乡安宁稳定生活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浇醒。我刚到家不久就得知我父母正计划搬家，他们将要离开我6岁时便居住的房屋。我和史蒂芬在剑桥广场附近预订了一间房子，但地产经纪人告诉我们，由于没有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新公寓被转给了后面的人。这时我才意识到，哪怕是我熟知的家乡也开始变得陌生冷酷起来。

一个令人泄气的午后，我和史蒂芬开始为下一步打算。史蒂芬决定找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财务主管商量,看他能否帮我们想想办法。我们来到财务主管办公室,开门的却是一位新人。原来在6个月前，财务主管已经换人了。跟前任不同,这位新财务主管显得很有耐心。他听着史蒂芬的解释,神情中满是关心,然后给了我们一个解决办法。他说:“哈维路旅馆有一间单人间,每晚12先令6便士,我们增加一个床位,你们应付25先令一晚。”这价格完全是敲竹杠,但我们不得不先找个落脚之处。我们计划着先住进去,然后想办法尽早搬走。

尽管学院的管理者苛刻吝啬，但学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哈维路旅馆的后勤人员真是善良至极。他们在我们入住前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帮我们开通了暖气,并将床垫打足了气。他们为我们入住的第一个晚上端来了饼干和茶，第二天早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口的早餐。他们甚至还主动提出帮我们洗衣服,我们向他们表达了感谢并婉拒了他们提供的服务。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会很短。